

陈寅恪与傅斯年均出生于清代名宦之家，青少年时代留学欧美，后成为
 耀眼的学术大师。一在清华大学国学
 院，开既道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均
 促进了学术的研究与繁荣。由于日本的全
 面入侵，傅斯年与史语所搬迁至重庆李庄，
 物质极度匮乏，艰难度日之中，傅力
 陈赴李庄共担大任。陈寅恪逃离北京，
 家南迁，经长沙，至昆明，再辗转至
 桂林，不幸途中病倒，双目失明，生活极度困顿，不得已转赴条件稍好的成
 都燕京大学，与李庄缘悭一面。陈傅本当携手共创学术盛业，但在风卷残
 云的时势下聚少离多，终至劳燕分飞，阻隔于海峡两岸，相望而不能相
 聚，一个暴毙在孤岛议会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岭南病榻。这是一部20世纪上
 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惘良久。

陈寅恪与傅斯年

岳南 著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寅恪与傅斯年均出生于清代名宦之家，青少年时代留学欧美，后成为
耀院，开既道
进的学术大师，一在清华大学国学
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均
创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他们是
真挚的朋友，还是姻亲，更是
友，彼此信任，相互关照，共同

陈寅恪

傅斯年

由于日本的全
侵，傅斯年与史语所搬迁至重庆李庄，
物质极度匮乏，艰难度日之中，傅力
陈赴李庄共担大任。陈寅恪逃离北京，
家南迁，经长沙，至昆明，再辗转至
林，不幸途中病倒，双目失明，生活极度困顿，不得已转赴条件稍好的成
都燕京大学，与李庄缘悭一面。陈傅本当携手共创学术盛业，但在风卷残
云的时势下聚少离多，终至劳燕分飞，阻隔于海峡两岸，相望而不能相
聚，一个暴毙在孤岛议会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岭南病榻。这是一部20世纪上
半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惘良久。

岳南 著

半世纪已逝寅恪

寅恪与傅斯年

傅斯年与陈寅恪

傅斯年与陈寅恪

傅斯年与陈寅恪

傅斯年与陈寅恪

傅斯年与陈寅恪

傅斯年与陈寅恪

傅斯年与陈寅恪

傅斯年与陈寅恪

傅斯年与陈寅恪

傅斯年与陈寅恪

傅斯年与陈寅恪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寅恪与傅斯年 / 岳南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5613-4332-6

I. 陈… II. 岳… III. ①陈寅恪 (1890 ~ 1969) — 生平事迹
②傅斯年 (1896 ~ 1950) — 生平事迹 IV. K825.81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7593 号

图书代号: SK8N0274

上架建议: 畅销书·人物传记·现代史

陈寅恪与傅斯年

著 者: 岳 南

特约编辑: 邱承辉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张丽娜

版式设计: 姜利锐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480 千

印 张: 24.5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13-4332-6

定 价: 38.00 元

独为神州惜大儒

CHEN YINQUE YU FUSINIAN

前几天，岳南先生来到我的寓所，携来《陈寅恪与傅斯年》书稿，嘱我看后提些意见。我虽是九十八岁的老人，精力不济，但面对这部撰述陈、傅两位恩师，并插有堂兄何思源青年时代与陈、傅二师一起留学欧洲相交甚笃的图片和文字，百感交集，遂未作推辞，决定先读为快。书稿翻阅一遍，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两位大师的身影又在眼前浮现。既然作者有此盛意，借此机会，说一说陈、傅二师对我的栽培和教诲，顺便写下一点读后感言，算是对两位恩师的纪念，以及对作者岳南先生为此付出心血与汗水的答谢吧。

我是1931年冬认识傅先生的。1931年暑假，我考上北京大学，进入史学系。我的堂兄何思源（仙槎）写信给傅先生，请他做我的保证人。他们是五四时期的同学好友，后来又一起在欧洲留学数载。我于一个晚上持信去看他，那时傅先生住在西城内平安里往东不远再往北的一个胡同里，好像是厂桥胡同吧。

傅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大学应如何学习，并嘱我两句话：“一

定要学好古文，一定要学好外语。”说来惭愧，我一生既没有学好古文，也没有学好外语，但越来越觉得学好古文和学好外语的重要，时时想起傅先生这两句话，念念不忘。

傅斯年先生有学术心，也有学术事业心。他北大毕业后留学欧洲，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他出任所长，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会、政治领域的职务千变万化，名堂甚多，但史语所所长这个职务却是他一直担任到底的。他以史语所为基础，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的历史、语言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特别是田野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到傅先生与李济、梁思永等那一代人手中才成为科学的，小屯殷墟的考古发掘是傅先生和史语所同人建立起来的最早的科学工作。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二十三年中，为中国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培养了众多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在这方面有贡献的学者，大多都受过他的培养。因而在这一领域，傅斯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傅先生是北大培养出来的，也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对北大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除了创办史语所，对北大的贡献也功不可没。抗战前，傅斯年除了担任史语所所长，还兼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文科研究所所长等职务。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四年，和傅先生接触不多，但听过他讲的中国古代史课程。他讲西周史，处处有新意，有创见，使人开阔眼界，开阔胸襟。听他的课，很佩服他广博的学问和深厚的功力。前几年，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称赞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并说此文与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两篇文章。在我看来，傅先生除了这篇名满天下的雄文之外，在他身后留下的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文字中，我更看重《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而后乃东迁》、《姜原》，以及《论所谓五等爵》等篇章。

②

这些文章的好，不在于篇篇掷地有声，而在于它们和《夷夏东西说》一样，都是有创始性和突破性的大手笔与天才之作，只有大手笔和真正的天才，才能写出这般具有史识、史见，震古烁今的光辉篇章。

我说傅斯年是我的老师，这老师不是泛泛的老师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恩师。1935年我从北大毕业，他邀我去史语所工作，我没有去，而是赴日本读书。抗战爆发后，我回国在重庆编杂志，写社论，在机关里混。后来失了业，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发一部分专款协助一些人员在国内做研究工作，我请傅先生推荐我，取得了中英庚款协助，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我有了收入，一家三口生活得以维持。

1944年，何思源大哥回山东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要带我回山东做官。当时我正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任编审，该会的负责人是段锡朋，段与傅斯年先生同为“五四运动”时期学生领袖，为人精明苛刻。我原已不想再在训练委员会待下去，但也不愿去山东做官，我还有自知之明，自知做官是最无能的。抗战后期论政之心已倦，极愿回书斋生活。我去看傅先生，说我愿去史语所念书。傅先生说：“毕业时就约你来，你不来。”就这样我进了当时已搬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李庄，我和傅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只是我同所内大多数学长、学弟一样，对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个字来表达，那就是“敬”、“怕”、“亲”。所谓敬，大家对傅先生的学问没有不是满心尊敬、佩服和崇拜的；对于怕和亲，说老实话，傅先生的性情不同常人，极易冲动、暴怒，像个孩子，因而大家对他既怕又亲。正像董作宾所说：其实傅先生对朋友，对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爱他之处也在此，但年轻人的“敬”和“怕”却又压住了他们的“亲”。或许这便是当时的内在真情吧。

抗战之后，我去美国留学，1950年回到北京，12月去看郑天挺师，进门他就对我说：“孟真（傅斯年先生的字）先生去世了！”我一时愕然，沉默了半天没说话。

行文至此，禁不住思绪缥缈，泪眼婆娑，一时回到北大，一时回到李庄，一时又回到现在，情肠交结，不忍追忆。当年史语所在李庄的几十口子同人、

师友，傅先生去了，董作宾先生去了，李济先生、梁思永先生、石璋如先生、夏鼐先生，以及与李庄擦肩而过的陈寅恪师也去了。想到这里，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令人倍感伤神。

屈指算来，到今天，傅斯年师去世已58个年头，而陈寅恪师去世已39年矣。我自己也渐渐老了。回忆接受傅斯年、陈寅恪师教诲的日子，犹历历在目，感念不已。

我与陈寅恪师相识于抗战爆发之后的西南之地，最早见到他是在重庆，后来我到了史语所历史组任助理研究员，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与下属。尽管接触不多，但有论文经常寄给他请教。在李庄的后期，陈寅恪师已赴成都燕大任教，他的眼睛已患严重的疾病，但对我的论文与晋升职称等事宜，时刻挂念在心，这样的事例从陈、傅二师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岳南先生在著作中已有摘录，不赘。有一次，听从成都回李庄的一位史语所同事说，他去拜访陈寅恪先生时，陈师对我的学问与人品还夸奖了一番。我听后受宠若惊，感到莫大的荣幸，同时也感汗颜。抗战胜利后，陈先生从英国治病回到南京，住在俞大维公馆。这个时候，我与先生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经常受傅斯年先生或董作宾先生委派，给他送信、送物或者送钱等。借此机会，我也请教了一些史学上的难题，已双目失明的陈师都一一作答，令我深受感动。

陈寅恪先生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傅斯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上半叶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能称得起大师级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郭沫若、顾颉刚等几个人吧。

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岳南先生在这部《陈寅恪与傅斯年》文学传记书稿中，不仅讲了陈、傅两位大师级人物，上面列举的另外几位大师，也大都有不同篇幅的描述和介绍，只是叙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过去几十年，在祖国大陆，没有看到关于傅斯年的传记，甚至连普通的介绍文章也较少。随着政治思想逐渐放开，前些

年傅先生家乡聊城的父老乡亲，为此做过不少的努力，召开过几届“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也出版过几本传记性书籍与论文集。但总的感觉，其声势与深入人心的程度，与傅斯年本人的声望和在学术上的贡献比起来，还是不够匹配，不到位。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一代，甚至包括相当一部分中青年知识分子，能知傅斯年为何许人也，做过何种事业者，已不是很多了。人类是容易健忘的，对傅斯年及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健忘，不知是历史的无情，还是今人的不幸？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史事，在此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大多是把先生的人生境遇一分为二，对前几十年生命历程的叙述相对薄弱，而后半生，特别是陈先生最后二十年着墨较多。我猜想，这可能是陈师前半生留下的资料较少，而作为传主“出彩”的地方也较少的缘故吧。

岳南先生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令我看到的是，他尽可能地搜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家族前辈人物的一些史事，简明扼要地进行叙述点评，尔后对陈、傅二人留学期间，特别是在欧洲的交往史实，进行了多方搜罗和鉴别比较，通过当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书信来往与局外者的回忆文章，一点一滴查找、拼对、复原，基本勾勒出一个轮廓，让后人看到陈、傅二人在那个时代较为清晰的身影，以及二人在学术上相互影响、砥砺，渐行渐近，肝胆相照的生命历程。

几年前，岳南先生为撰写《陈寅恪与傅斯年》这部书，找过我几次，特别是对抗战期间知识分子流亡西南的事情，询问得尤为仔细。我谈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情况。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岳南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个基础上，他耗几年心血成就了这部著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写作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此书涉及不少史事属首次有理有据、条理清晰地对外披露，填补了陈、傅两位大师研究领域的空白，对研究者与普通读者予以启迪的方面不少。

正如岳南先生书稿中所描述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1948年后，陈、

傅两位大师被迫离散，一位留在了大陆岭南中山大学，默默承受一系列政治苦难和心灵煎熬；一位归骨孤岛，长眠于台湾大学校园。两位天才的聚合离散，既是大时代的因缘，也是二人性格与思想观念不同所致。去台后的傅斯年曾把主要精力用于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他想把这座日本统治时期创建的学府，改造成现代一流的大学和学术中心。可惜天不假年，他仅在台大校长任上奋斗了两年即溘然长逝，去世时年仅 51 岁。而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先生逐渐落入了凄凉之境，于“文革”中精神备受折磨而死去。

当年与陈寅恪、傅斯年同时留欧，且是好友加亲家的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 Magnum Opus 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作为后来者，面对岳南先生撰写的这部著作，以及著作中所描述的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聚合离散，或许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吧。

是为序。

何兹全
时年九十八岁
2008.3.23.

何兹全，山东菏泽人，1935 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旋赴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归国，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46 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学，1950 年归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著有《读史集》、《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何兹全全集》（六卷）等作品。

目 录

CHENYINQUE YU FUSHIAN

独为神州惜大儒（何兹全） 1

第一章 风云际会 1

- 走进清华园 1
- 从北大到柏林 8
- 北京初会 14
- 槎浮海外 23

第二章 江湖多风波 35

- 欧洲行旅 35
- 柏林日夜 42
- 罗家伦信件披露的隐秘 51
- 傅斯年归国 61
- 中山大学的暗流 66

第三章 南北两校园 71

- 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 71
- 由同窗到仇寇 80
- 陈寅恪进清华的背后隐秘 84
- 独为神州惜大儒 92
- 王国维沉湖 97

第四章 史语所的第一桶金 105

- 元和新脚未成军 105

内阁大档的“发见” 112

陈寅恪与内阁大档 118

第五章 望断天涯路 125

卢沟桥事变 125

流亡途中 128

再别长沙 133

第六章 南渡记 141

暂住蒙自 141

迁往昆明 145

炸弹下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148

第七章 中研院院长争夺战 155

八方风雨会重庆 155

来渝只为胡先生 163

扬子江头流亡客 167

第八章 纵横天涯马 175

傅斯年家世情缘 175

辞别重庆 183

营救陈寅恪 186

“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192

第九章 与李庄擦肩而过 199

骑上虎背的叶企孙 199

傅斯年与叶企孙之争 205

李庄不复见 212

第十章 西北望 221

乱世策士梦 221

傅斯年与毛泽东窑洞相会 225

延安归来 232

第十一章	千秋耻，终当雪	241
	初闻涕泪满衣裳	241
	代理北大校长	244
	重返平津	254
第十二章	魂返关塞黑	261
	在燕大讲台上的背影	261
	陈寅恪失明经过	270
	欲将心事付瑶琴	276
	陈寅恪与蒋介石的因缘	280
	赴英就医	286
第十三章	生别常恻恻	293
	日暮苍山远	293
	还都南京	301
	最后的晚餐	310
	北归一梦原知短	315
第十四章	斯人独憔悴	329
	醉不成欢惨将别	329
	退守孤岛	335
	傅斯年之死	340
第十五章	残阳如血	349
	南国的冬日	349
	汪篋、向达的悲剧	356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	365
	陈寅恪之死	373

第一章 风云际会

CHENYINGUE YU FUSHIAN

◎ 走进清华园

1925年，隆冬。

薄雾轻启，天色微明。惨淡的星光下，一个单薄瘦削的中年人携一幼儿，悄然离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红砖灰瓦的公寓，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乘车向大街尽头驶去。翌日上午，二人转乘的汽车穿越巴黎协和广场凯旋门，沿滨海大道驶入卡纳比埃尔街，很快抵达碧海青天、卷积云连绵不绝的马赛港。中年人提着行李，深吸了一口带有海腥味的空气，健步踏上停泊在港湾的豪华邮轮，身后的幼儿既兴奋又好奇地随即跟进。阵阵汽笛声中，一老一少作别欧洲大陆，穿越波滚浪涌的地中海，向魂牵梦绕的东方故国驶来。

翌年7月8日，中年人出现在北京西郊清华园那花香飘拂的荷塘边，清癯、睿智的面容与摆动的长衫，立即进入了学界的视野。

——时年37岁的陈寅恪受好友吴宓举荐、清华校长曹云祥聘请，告别长达16年海外游学生涯，来到这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的大师之园，以教授身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人生之旅。

清华学校的建立，其源头要追溯到1909年6月。当时大清王朝的掌权者受时风熏染与国内外形势所迫，在北京设立了一个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这年8月，经外务部和学务部一同奏请，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馆址，并拨款修建了馆舍。

在1909—1911三年时间里，游美学务处于北京城内史家胡同等处考选了三批共180人直接留美生。入选者到美后，视不同条件或直接进入美国大学就读，或先进入美国高级中学补习，而后再进大学。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办公，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这年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由此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

最初的十几年中，清华学堂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教学则相对薄弱。1924年初，清华学校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程序。

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的限制，筹备人员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优秀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即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提出的：“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1]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立即动员原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

留学生，以第55名成绩放洋美国，并于1917年归国未久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文学院哲学教授胡适（字适之），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时年34岁，尚不算糊涂的胡氏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

清华园内的二校门



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尽管胡适此时的学问日益进取，地位和名声在新派学界如日中天，但他毕竟算是个心中有数之人，面对曹校长的一番抬举，并未得意忘形，更没敢轻视王国维、梁启超等诸前辈学界泰斗的真实存在，忽略王、梁等人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仰止”的伟岸身影。他清醒并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2]曹校长见对方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



风华正茂的胡适

1925年2月，在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住处一一聘请。曾任宣统朝五品“南书房行走”之职、时年49岁的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作为满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此前，曹云祥曾托胡适向王氏转交过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聘书送到后，胡适怕这位性格内向的学术大师优柔寡断，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在清华园转了一圈。王氏见园内风景优美，校内颇具规模与秩序，始有进清华的念头。此次吴宓在登门之前，对王氏这位清朝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了调查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欲一举拿下。待到了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所后，吴宓采取入乡随俗之策略，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居然把自己当做一个有身份的前辈人物看待，尊敬有加，顿觉有了面子，心中颇为舒畅痛快，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

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3]——吴宓的三个响头总算没有白叩。

王国维虽打定主意，但又想到自己仍是前清皇朝的臣子，为人臣者，乃唯君命是从，像这样工作调动之大事还得按旧规矩向“皇帝”禀报，看“上面”是否“恩准”，然后才能正式决定行止，否则有失体统。于是，他憋在家中颇费了一番脑筋，经过几次“吭吭哧哧”的反复思量，又偷偷摸摸跑到天津拜见逊帝溥仪，在“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4]后，才放下心来，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携家人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王氏到校，立即在师生间引起轰动，鉴于他在国学界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有意请其出任研究院院长一职，王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5]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梁氏尽管年过半百，思想不再像当年“公车上书”，凭一介书生之血气与康有为等举子在北京城奔走呼号，掀起著名的“康梁变法”滔天巨浪时那样激进，且已有保守之嫌，但凭借他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文史巨著，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当时中国学界曾称“太炎为南方学术界之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之北斗”，南北两大巨星相互映照，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史学星河中灿烂绚丽的风景。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国学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同堂共事，得此礼聘，“疯”劲顿起，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下并踏上一只脚，高声示众，以示决绝之态。自此，“章疯子”失去了在清华园一展风采的机会，清华园也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第一届招收了38



进清华前的王国维

名学生，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自己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情超群，知识广博，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正担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之职的吴宓，一看张氏荐举了自己的同窗故旧，也不甘示弱，灵机一动，借机向曹云祥推荐了自己在哈佛攻读时的同学——这便是后来被誉为中国史学界“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

原籍陕西泾阳的吴宓（字雨僧），1916年于清华学校毕业，次年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就读。获得学士学位后，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攻研哲学。就在这个时候，来自江西义宁的陈寅恪经在美国哈佛就读的表弟俞大维介绍，入哈佛大学师从东方语言学大师兰曼（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既进哈佛校园，自然要与中国留学生结交，陈寅恪很快与姜立夫、梅光迪、汤用彤等辈相识，当然还有终生挚友吴宓。其间，由于陈寅恪、吴宓、汤用彤三人才华超群，成绩卓著，引起中国留学生的瞩目，一时有“哈佛三杰”之誉。而作为三杰之一的吴宓，则对陈寅恪的学问人品推崇备至，赞为人中之龙，相识不久即以师长待之。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也是日记高手，行文优美，议论独到，与好论政治时势的胡适日记大为不同，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引人入胜的“好看”程度，在学术界备受推崇，是研究陈寅恪生平史事的一扇不可或缺的窗口。据已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载，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的吴氏受中国学生会之请，作《红楼梦新谈》演讲，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见得处处精上，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6]

当吴宓正意气风发地在讲堂上慷慨激昂地演讲之时，刚进哈佛



1906年梁启超与梁思顺（右）、梁思成（左）、梁思永三儿女在日本东京留影